



请讲

抗战时期山东企业艰难内迁



徐畅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近代中国工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。据国民政府1936年对30名工人以上并以油、电、汽等为动力的工厂登记,东部沿海

省份共3178家,数量和资本均占已登记工厂70%以上。山东全省以及青岛、威海卫特别市现代工业较为发达,较大规模者228家,占全国新式工业7.5%。

抗战爆发后,东部省份企业如毁于战火,则民族工业元气大伤;如沦于敌手,则是助纣为虐。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下,国民政府1937年9月制定《沿海各省市工厂迁移内地制造办法》,规定沿海山东、江苏等各省和上海、青岛等市之重要工厂设法迁至内地。以此为契机,大量企业西迁内地,据统计,仅内迁民营工厂就超过600家。

在这场被晏阳初喻为“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”、战争史上的奇观、中国工业史上壮举中,山东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首先,民营企业内迁。抗战

爆发后,周志俊将青岛华新纱厂部分机件拆迁,运往上海租界,办起信和纱厂、信孚印染厂和信义机器厂。1941年又准备到重庆设厂,但因太平洋战争发生未能成功。尹致中将冀鲁制针厂部分设备运到上海,成立大中工业社股份有限公司。上海沦陷前,大中公司响应政府号召,将部分机器及物资运往重庆,成立大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,下辖制针、机械、石棉3个工厂。济南陆大铁工厂在战火逼近之时,将103吨机件物资运达汉口,1938年1月又西迁重庆,成为后方技术比较先进的民营工厂。七七事变后,成通纱厂部分机件内迁陕西,因损失严重,迟至1941年方才营业生产,改名益大机器厂。

其次,国营企业内迁。1937

年8月,四方机厂在副厂长顾揖等人带领下,将刀架、车床、车轮、电动空气压缩机、电动机、铸钢用转炉等设备装载3列车,数次辗转,运往大后方。9月,兵工署直辖4个工厂之一的济南兵工厂奉令迁往西安,全厂3000多吨设备器材分装11个车皮,10月运达西安。1938年3月,奉令移建重庆,生产小型弹类和掷弹筒、木柄手榴弹,是为第30兵工厂,所产手榴弹性能、质量优于同类产品。10月,山东中兴煤矿720吨机件西迁。

抗战时期工厂内迁无论是对大后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,还是对技术和管理方法的提升,均影响深远,贡献重大。然而,与上海工厂内迁相比,山东规模较小。究其原因,约有三点:首先,国民政府不重

视。1937年9月中旬,军事学者蒋百里致函蒋介石,认为山东潍县等观战工厂很多,应设法迁移,而资源委员会在内迁工厂时未加在意。12月,青岛市长沈鸿烈两次急电工矿调整委员会:青岛5家重要工厂“决定迁渝、汉、西安”,请求解决运输问题,但是该会复电称:“现运极繁,重要物资如煤斤等均苦无法南运。调车之争,力与愿违,深以为愧。”其次,山东省政府漠视。例如华丰机器厂滕虎忱先后三次向山东省政府呈文,要求将设备搬运汉口,生产武器支援抗战,以免沦落敌手,但韩复榘一心急于逃跑,无暇顾及,直到省政府撤出济南,也没有调拨一节车皮。最后,日军推进过快、运输工具不足等,是山东内迁企业数量过少的客观原因。

济青抗战“双城记”

韩复榘与沈鸿烈的同途殊归

本报深度记者
刘志浩 寇润涛

“已经尽力了”的青岛

来青岛采访,总让人无端想起济南。

与济南人说起韩复榘多是一脸不屑,青岛人谈到沈鸿烈,几乎无不自豪。

“沈鸿烈在抗战中的表现,绝对是这个。”4月3日上午,退休于青岛四方机厂史志办的地方史研究者陈光荣,说起沈鸿烈几次竖起大拇指。

尽管最终魂归宝岛,但这并不影响沈鸿烈在青岛人心中的地位。自1931年以海军司令之职兼青岛市长后,沈鸿烈主导修建大港三号码头、青岛船坞、市体育场,拓宽并修建青岛栈桥、薛家岛码头,整修市内主要交通要道,设立“救济院”、“感化院”等。无论是市政还是民生方面,均成绩斐然,抗战前青岛已跻身全国八大城市。

比较而言,青岛的历史并不如济南“根正苗红”,自1891年清政府在此设制,到1945年抗战胜利,这座近代以来才成形的大城市,除了中间一段短暂时期(1922—1938)名义上被中国政府接管外,54年中长达三分之二的时间被德日占据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座城市就没有引以为傲的历史。

1937年12月底,济南陷落,青岛同样陷入了兵临城下的困境。

如果没有沈鸿烈,青岛在抗战史上留下的印记,或许会与济南无异,但历史从来没有假设。

根据时任青岛市政府人事处长芮麟的记录,“七七事变”后,青岛一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:日本人想占领,却受兵力不足制约,并忌惮这里的2万多侨民及200家日资工厂受损。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面对疯狂推进的日军,无太多招架之力,想保青岛,更是有心无力。

这种情况下,沈鸿烈坚持了下来,并以“大事不让,小事不争”的策略,集全城之力,与日军反复周旋,小心翼翼把这种“和平局面”维持了四个月之久。

此时的青岛,像是秋风中瑟瑟抖动的一片树叶,随时有凋落的可能。1938年1月,尘埃落定,青岛沦陷。陷落前夕,沈鸿烈率队南迁。

他已经尽力了,这是青岛人对沈鸿烈的评价。

无论是沈鸿烈“撤离”青岛还是韩复榘“抛弃”济南,留给两个城市的结果是一样的——日本人几乎毫不费力地占领。

几乎相同的境遇,却留下截然不同的评价。看抗战初期青岛和济南的这段历史,令人唏嘘。数十年后,面对这两个城市当时最高的主事者,前者被评价为“口碑极好”,后者却被极尽挖苦讽刺,尽管他的执政并非一无是处。

路遥在《人生》中曾引用老师柳青的话说,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。对于那些历史人物而言,这句话同样适用。



1938年,日军从青岛栈桥登陆。(资料片)



沈鸿烈 (资料片)



韩复榘 (资料片)

“被抛弃了”的济南

同是撤离,南迁的沈鸿烈带走了大批机器设备及技术人员,至少给青岛留下过一丝希望。而韩复榘南撤,留给济南的更多是怨愤和绝望。

“当夜,济南人民只闻黄河北岸(日军)南击的隐隐炮声,绝无一声南岸还击的炮声,更听不到任何枪声。”这是1937年12月26日陷落前夜,济南大实业家苗兰亭记叙的当时的情景。

如苗兰亭一样,当时多数济南人的直接感受就是,“被抛弃了”。

原本准备迎接残酷枪林弹雨的济南人,没想到会面对这样的结局,败得如此彻底,如此窝囊。

城中仅存的“战争景象”,是商埠中冒着的几处浓烟——临行前,韩复榘忠实执行了上峰的“焦土抗战”政策,烧毁一些厂房、仓库,但却选择性屏蔽了“死守济南”的命令,也无怪后来蒋介石枪毙韩复榘的罪状的第一条就是“违抗命令,擅自撤退”。

是夜,韩复榘率军全部撤出济南城。第二天上午9时后,日军占领

济南。“日兵们骑在马上顾盼自若,缓步行进那种如入无人之境的得意神情,实在‘令人发指’。”即便过了几十年,忆及当年情景,气愤难抑之情仍充斥字里行间。

希望随时随风而去,之后济南工商业遭受沉重打击,与此前欣欣向荣景象,截然两个世界。

与当时到济南“淘金”的诸多民族资本家类似,借着清末济南“自开商埠”的时代机遇,以苗兰亭为代表的鲁商,纵横捭阖,广办实业,并逐渐积累起庞大的财富,成为近代济南最早的一批实业家。如野火般的商业发展态势,已渐成燎原。但随着日军的侵入,一切顿变过眼云烟。

当然,就面临的形势而言,当时南下日军势头正盛,即便抵抗,也多半落得城破人亡的结局。但韩复榘的弃城,则让希望直接破灭,不管是留下的还是离开的,同此一心。

1938年,因为济南沦陷而不得不随省图馆长王献唐“护书南行”的省图馆员屈万里,曾在记叙他们经历的《载书漂流记》中,如此描述日军兵临城下时山东最高长官韩复榘的作为:“中央数令韩军反攻,

悉若罔闻。反派烟土,搜民财,以肥其囊,致敌人遂得志于山西。”

后来他们得知韩复榘被处决的消息时拍手称快:“人心大快……人惟恐其不死也”——愤慨之情溢于言表。

苦心经营变得无足轻重

说起来,沈韩两人之前的经历很是相似:文化人出身,曾分别投身于西北军和东北军,后倒向蒋介石,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山东,分别执掌青岛和济南(韩复榘名义上是山东省政府主席,沈鸿烈只是下属,实际上割据一方),并推行过大刀阔斧式的改革,给两座城市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。

其实,韩复榘并不是没有抵抗。在德州保卫战、徒骇河之战、津浦线反击战等役中,他的部下曾对日军进行了强力阻击,伤亡惨重。

在最为惨烈的德州保卫战中,德州人记住的是其下属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,而不是韩复榘。在济南,尽管与日军短兵相接,差点命丧于此,韩复榘依然没被济南人所颂扬。

如今,韩复榘被济南人“铭记”更多的,除了弃城不战的“事迹”外,还有诸如“大明湖,明湖大,大明湖里蛤蟆,一戳一蹦跹”之类的真伪难辨、像愤极而讽的段子。

对于战争,龙应台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:战争,是为了制敌,当情势悬殊,敌不可制时,保全性命和实力,不是羞耻的事。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,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?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,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。

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口,不管你有几千万个理由,与蒋介石有矛盾也好,实力不济也罢,“跑了就是跑了,说什么也没用。”昔日济南印染业的龙头——东元盛的后人张盛坤如此评价当年济南的这个主官。

平心而论,自1930年主政山东后,韩复榘提出了“澄清吏治”、“根本清乡”、“严禁毒品”、“普及教育”四项施政计划,其所推行的乡村建设计划,已经涉及政治及行政改革,至今被人称道。

日军兵临城下的时刻,韩复榘也像沈鸿烈一样,做过一些准备,如在胶济铁路部署队伍,严防日军,拒绝日军诱降并限期令其撤侨等。

但作为一省之主官,关键时刻的退却,让之前苦心经营的一切,变得无足轻重。

而这,也成为济南永远的痛。